

在“边缘化”的路途上

——论世纪之交精英文学的转型

吴秀明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探讨在世纪之交转型的大背景下以及“三元一体”的文学格局中,精英文学所历经的深刻的嬗变。作者首先对精英文学进行了学理界定,指出其概念内涵的最大特征就是先锋性;其次,论述了精英文学在新时期经历的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阐述了它由中心向边缘位移的尴尬局面;最后,文章就精英文学边缘化的现状与未来走向作了探讨,并提出了有关精英文学跨世纪发展的几点建设性构想。

在世纪之交的转型期,中国当代文学内部的急剧裂变,使整体文学在不算太长的时间里,很快地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走向。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主导意识形态文学,这三种不同形态文学的既分化又共存、既对立又互渗的局面的形成,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在这“三元一体”的文学格局中,精英文学又具有自身特殊的重要地位,发挥着自身特殊的重要作用。尽管它在整体上没有也不可能逾越当代中国固有的精神思想体系的基本框限,在所谓的“反文化”方面走得太远;但由于它毕竟是以激进的思想艺术探索和实验为鹄的,所以这就必然导致它与大众文学、主导意识形态文学无论在功能价值还是在精神旨趣上都大相径庭,彼此怎么也混同不了。如果把当前中国文学的内在结构形态看成是一个金字塔的话,那么大众文学就是它的基座,主导意识形态文学是它的塔身,而精英文学则是它的塔尖。从一定意义上讲,精英文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学的首席代表,它的存在及其发展如何,将会给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文学带来极其深刻的影响,并预示着文学新的审美萌动和未来发展的方向。正因为此,笔者认为,选择世纪之交精英文学转型这一课题来进行研究,在当下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在进入正题之前,首先要解决的是什么叫精英文学?所谓“精英”,是指社会为其设置专门职业

作者: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杭州 310028)。

或特殊身份的人文知识分子,这里的“文学”,也就仅限于他们的职业活动及其以文本为标志的成果。“精英”在文本中不是一个固有的和既成的静态模式,它是一个过程,一种在历史的相对稳定状态中的变异与前趋的不稳定因素。在概念内涵上,它的最大特征就是先锋性,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思想上的异质性,它表现在对既成权力叙事和主题话语的某种叛逆性上;二是艺术上的前卫性,它表现在对已有文体规范和表达模式的破坏性和变异性上。而且这种叛逆和变异还往往是以反文化的和较为激进的方式进行的。因为在文学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变革的因素是永远存在的,但异质性和前卫性的激变却不常有;唯有这种激变,它才构成“精英”式的文学现象或曰文学运动。可见,精英文学并不等于知识分子阶层的文学,它主要指的是比较纯粹意义上的人文知识分子所逐渐构建的某种独特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依法国尤奈斯库的解释,即指当代文学中的一种先驱现象,它在与现实关系的问题上,与“反对”、“决裂”具有相似的含义。当然,他们这套话语体系有时也会染上脱离大众或学院派的偏见,带有一定程度的贵族化、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倾向。

中国现代精英的前身,就是传统社会中居于“四民之首”的士人。他们不仅成为经典的和正统的解释者和传播者,从担当塾师到为帝王师,用道统控制政统,发挥着价值范导的功能,而且通过科举道路,直接参与政权,在仕途上追求出将入相,以实现自己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启蒙激活下,中国知识分子打破了封建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在自身的实践过程中,渐渐获得其现代性涵义,五四运动便成为知识分子及其文本现代性转换的仪式。当时新兴的现代出版报业和现代教育,为知识分子提供初具雏形的“公共空间”,并使他们得以摆脱传统的科举道路,通过自由职业发展自己的思想和学说。尤其是现代教育中的大学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机构,它既在国家权力体制之内,又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倡导以自由思想为风尚,师生以学术独立为标榜。因此,就成了一种特殊的反文化集合点——不仅成为对主导意识形态批判力量的基地,在某些时候也成为抵制商业化浪潮的基地。五四时期开始出现的以大学为中心聚合地的精英文学之迅速崛起,成为左右或改造现代中国的主要精神文化力量,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此。葛兰西当年研究西方社会时曾指出,现代社会分裂成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而统治阶级对政治社会实行命令或控制,但对公民社会实行“霸权控制”。看来这个观点应适当修正,至少在现代中国,这种“霸权”呈分裂状,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先进的人文知识分子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不再是“社会控制集团的代表”;而因其与现实的否定性、反抗性的本质规定以及超前性的思想艺术探索,成为主导意识形态文学或文化的批判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原则上赞成把大学划归到“反文化派”的系列范畴。是的,在中国这样的传统政治和社会力量强大的国家内,大学或学院恐怕就是最强大、也是最集中的反文化的策源地。

不过,也仅仅是“原则上”赞成,它并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这是因为精英文学并不是“反文化”所能全部概括得了的,它的内涵显然要比“反文化”大得多。而且,就大学自身来说,它的实际情况也十分复杂,并非铁板一块,一成不变。尤其是当新文学从五四“文学革命”推进到“革命文学”并步入社会和步入实际政治操作层面,而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出现“真空”时,其“反文化”就会从大学溢出,使文化批判力量变成政治力量,从而造成了文人的大量从政以及文学政治化的盛行。于是,精英文学与新的主导意识形态文学合一,以至成为新的意识形态模式的提供者,政治功利被极度强化突出就在所难免,也可以理解。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建国。所不同的是,1949年以后频频不断的文化大批判运动以及知识分子被纳入“国家干部”机制经常接受思想改造,更强化了这种文学政治化的态势。

二

粉碎“四人帮”后最初几年,精英文学基本也是处于这么一种状况。虽然意识形态即“道”的内容较之“文革”及“文革”前17年变了,但精英话语与主导意识形态话语那样一种一体化的结构却没有变。真正存在的是主导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精英形态的话语包括大众形态的话语往往是虚拟的,被悬置的;它们不过是提供了一个能指,而所指则由主导政治权力话语来规定。早期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大体就是如此。它们对“文革”和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揭示,基本没有逸出当时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外,能指与所指是断裂的。如卢新华的《伤痕》,用“哭诉式”的政治道德判决取代多元深层的文化审美反思。这样,一个巨大的能指可能具有的丰富所指无疑就被湮灭了,只剩下一个“权威”所指:即揭批“四人帮”。这也反映了精英文学在当时还依附在主导意识形态文学之下没有独立出来,它还仍然以主导政治权威为导向来重塑社会。

大概到80年代尤其是1985年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精英文学开始从主导政治权威话语中裂变出来,获得了自身的话语权,并且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一个既不同于主导权力话语又不同于大众通俗话语的独特的话语系统。当然,它远未摆脱主导权力话语的联系乃至操纵与干预。“寻根文学”的出现,就昭示了精英文学摆脱依附性的趋向。大家知道,寻根文学是一种复杂的运动,它既有寻“优根”,也有寻“劣根”。但无论是寻“优根”也罢,寻“劣根”也罢,它都是对现存一体化主导意识形态的一种突破。这是精英作家在“文化断裂说”的刺激下,企图直接超越主导政治所提倡的革命经典文化,也包括在空间上对西方主题模式横移的拒绝,目的是为了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可资继承的精神源头。如此这般,这与主导意识形态文学同样也是求发展、拒绝西方文化的主题模式横移,但却立足于马列主义经典文化包括五四以来革命传统文化的本位,以此作为思想武器是有本质区别的。几乎与“寻根文学”同时并至的“先锋实验文学”——先是刘索拉、陈村,后是马原、格非、余华、苏童、孙甘露、北村,他们极度张扬个性自我,调侃“意义世界”及其寻找的努力,其实内中也包含了对主导意识形态文学崇尚的理想道德的深刻怀疑和消解的成分。无可否认,这种怀疑和消解当然不乏有批判陈腐僵化或左倾思想观念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对人类固有的伦理道德规范构成极大的颠覆。当“意义”、“崇高”、“理想”一类精神性的东西从我们存在的生活中消失之后,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本身不也就变成了一种空洞的能指、荒诞的象征吗?精英文学一旦打出“先锋性”、“实验性”的旗号,便意味着它与主导意识形态话语、大众话语的脱离,变成了少数精英知识分子进行“化大众”的、自言自语的话语。自然,与“寻根文学”不同,“先锋实验文学”是以西方的现代文化思想作为源头和价值参照的。正因这种文化相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现代的异质文化,所以它较之于“寻根文学”,其对主导意识形态文学的超越不仅力度更强,而且更具现代性。于是,“先锋实验”的结果,是有效地推动了整个文学向西方向现代性的转型。也正因此,“先锋实验文学”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一直不间断地受到“主导意识形态文学”的批判。它们彼此的矛盾冲突,构成了当代文学最引人瞩目的景观,就不奇怪了。

自80年代后期、90年代以来,精英文学开始了悲壮的衰落过程。这种衰落诚然取决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变革——主要原因则在于伴随着社会变革,乌托邦的迷人的魅力逐渐消褪,世俗的、物欲的价值被无限夸大,成为人们新的追逐对象。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也与精英文学内部的自我颠覆以及思想贫血和精神萎缩有关。这里,王蒙呵护王朔的事例就比较典型。王朔以“痞子”式的叛逆姿态出现于文坛当然自有其深刻的必然性,但它在消解虚伪僵化意识形态的同时,却形成了对精英文学崇尚的“意义世界”的解构。就后者而言,王朔可称得上是“精英文学”的“不肖子孙”。而王

蒙作为“精英文学”的首席代表,非但未指出他对“精英文学”解构的破坏性的一面,反而严正认可其“躲避崇高”、“消解意义”的合理性,这不正等于宣告“精英文学”的“意义世界”构建已无可挽回地崩塌了么?此种情形,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它的出现,犹如一个信号,标志着“精英文学”在经历了80年代初中期短暂的辉煌之后,已急转直下,呈现了整体性的大滑坡。事实也正是如此,就在王蒙竭力为王朔的“躲避崇高”张目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精英作家急剧地从形而上理想理性层面醉入形而下生存欲望层面的表现之际。90年代初那几年,“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如日中天,在文坛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热”潮,大批的作家、批评家汇聚在这些“新”字号的麾下,他们不谈“崇高”,拒绝“批判”,放弃对思想与艺术的超前探索,而热衷于用“零度情感”描述日常“活着就好”、“过把瘾就死”、“懒得离婚”的世俗生活,或沉迷于语言的拆解、颠覆、重组与游戏,把创作当成与社会、与他人完全无关的“私人化”行为,就足可资证。尤其是“新写实”,它描写的几乎纯粹都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此时的日常琐事:排队买豆腐白菜洗衣服做饭上班下班带孩子长工资提级调房子,认为人生一切就是如此,超越此时的努力不仅成为一种乌托邦的幻想,而且与日常存在的精神对抗亦是一种徒劳的行为。这说明知识精英从启蒙姿态的“化大众”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大众化”,已失去了自己独特的话语和主体性。而这样,它又怎么能够构成对主导意识形态文学、大众文学的批判、监督和制衡作用,使三者互渗互融,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呢?对文学精英与精英文学来说,自我的救赎都成了问题,拯救他人又何从谈起。在文学精英的圈子里,人们老是抱怨这抱怨那,就是没有想到自己。其实,最可抱怨的还是知识精英自身的先锋性的消褪,批判职能的丧失,整体素质的不高。一俟在这根本性的精神思想上出现问题,那么,至此精英文学就进入全面“沉沦”阶段,蜕变分化不可避免。我们当然不能说,这就是精英文学的全部及其发展前景,但既然精神思想贫血和萎缩,牵一发而动全身,它就必然消除精英作家原有的激情和理想,使其文学的整体精神出现蜕变与分化。这种蜕变与分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大走向上:

其一,一部分精英作家迎合大众社会的需要,从原先精英文学的格局中分离出来,开始与大众文学相融合,并在新的经济——市场导向开放文化形成过程中,逐步演变成相对独立的文化集团或曰新的知识阶层。在当今社会,这批人主要是由那些以满足市民文化消费的各种大众传媒的掌握者和运作者来扮演的,包括书商、编辑、出版家、制片人、大众文学作家、表演艺术团体的负责人、穴头、影院音像公司的管理人员以及各种文化掮客。他们接受商品意识,谙熟市场规律,游弋于知识精英与大众文化之间。他们既是文化人,又是传播者,同时还是经营者。由于身份特殊,尤其是处于特殊的中介角色位置,这批人“可以直接干预、诱导甚至垄断审美文化的产生,如出什么书,上演什么节目,如何对演员进行形象设计或‘包装’等;同时,他们又可以诱导大众的消费潮流,塑造消费者的趣味,甚至是人为地制造出流行的时尚和偶像。”《废都》的流行,就是作者弃雅从俗,与这批传播——经营者精心“包装”的结果。另外,文坛上不时有“×××热”的出现,也跟这批人迫于文化市场的“格雷欣法则”对作家施加诱导密切相关。作为一种“亚文化”,中国的大众通俗文学向来地位低微,它是不得志的“潦倒文人”在科举及第无望之后的一种“自我放逐”。如《品花宝鉴》作者陈森在应试前,友人劝他写小说:“时余好古文诗赋歌行之类,而稗官书一尝心厌薄之。”及秋试下第,境益穷,志益悲,块然磊于胸中,而无以自消。”这时友人再劝他写,“余亦心好之”。这里的变化是被动的,很有自降身份的味道。而现在在市场经济文化的大环境下,知识精英却“渴望堕落”,主动汇入大众文化的世俗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两相对比,不能不使人感慨万端。

其二,另一部分知识精英退入象牙之塔,“告别革命”,埋首于比较规范、精致的创作或学术研究中,从原先的政治文化激进主义变成了文化守成主义。这种情况在大学中颇有市场。80年代,中青年学者和批评家“溢出学院”,以充沛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积极从事文化启蒙,使大学成为思想文化战线的一个重要堡垒。如三次朦胧诗“崛起”的声音,都是由大学首发的。而90年代,

当这一代学院派精英所预言的一切未如期而至,相反,历史却以另外一种他们不曾想到、也不愿看到的方式前行时,就自然地表现出了对现实和社会政治文化的冷漠,那宏大的宣言和慷慨允诺已晃如隔世。如北大年轻学者陈平原教授在其主编的《学人》和《文学史》刊物的“后记”中,就不止一次地表白:“几年来,孜孜以求,不想惊世骇俗,但愿能‘理得’而‘心安’。……与其临渊慕鱼或痛骂鱼不上钩,不如退而结网。”追求持重厚实的学术品格。……强调引文注释的规范化,无非是想提倡一种老老实实读书,认认真真作文的学术风气。”这种“退而结网”的作法是很带有点无奈甚至不无悲凉的心情的,它既有消极遁世的思想,也有积极的学科建设的价值。用陈思和的话说,就是从“广场”退回了“岗位”,在“岗位”上“著书立说,开创(了)许多现代人文学科。”反映在创作上,其突出的表现恐怕就是对政治文化普遍冷淡、疏离,对现实社会中的重大问题或有意回避,或冷眼旁观,缺乏应有的关怀。于是,有相当一批“激进”的精英作家,相对缓和了其既往的“激进性”,进入一种相对“平和守成”的状态。苏童率先置身“历史”,热衷于武则天奇异人事、性事的叙述,余华也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暴力恐怖的迷狂(如《活着》),更为令人感叹不已的是普遍复活了旧文人传统,“隐逸”之风开始盛行,“闲适”的倾向骤然升温,得到了意外的鼓励,怀旧热持续不断,行情看涨。从汪曾祺的笔记小品,到贾平凹的《废都》;从领袖传记文学《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到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从戏说历史到周作人、林语堂散文的一版再版,并且不断地制作出新的膺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激进”在减弱,“张力”在缓解。这样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意味着自动放弃精英文学的中心地位。

其三,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仍然坚守精英文学的立场,抵抗世俗文化的侵蚀,执著于“独异个人”的叙事激情。张承志、张炜就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他们面对90年代商品经济带来的负面现象,大声疾呼,希望人们保持精神的纯洁,重新回到信仰的怀抱,并在陕甘青贫瘠的高原,在齐鲁大地上,重温着“人民神话”的余辉,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具有独立思考 and 独立人格的“精神自由”之旅。在创作上,他们强调匡时救世、重铸民族精神的灵魂,强调对历史、存在和人性的深度勘探与寓言讲述,强调启蒙主题的宏伟叙事和诗性言说,反对叙事的碎片化、意义的空心化和对深度模式的拆解。这种创作倾向与以大学尤其是与以上海为中心的大学中一批中青年教授、学者、评论家所发起的“人文精神”的讨论不谋而合,旨在高扬文化理想主义的旗帜,在此麾下重新凝聚精英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度,挽救精英文学整体式微的颓势。当然,由于对社会文化转型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以及其他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二张”在坚守精英立场的同时,也明显表现了皈依宗教、膜拜大地的倾向。这种宗教或准宗教、拟宗教的情结,不仅在“二张”,同时还在何士光(如《如是我闻》)、北村等作家身上也有表现。它的存在,其实从深层次上反映了精英文学的内在孱弱和文化资源的不足。需要指出的是,1995年以来,疲软的文坛出现了以刘醒龙和谈歌、何申、关仁山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跟以文化理想主义为本位的“二张”不同,这些作家更多着眼于现实生活本身,通过对经济转型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揭示来表达自己真切的“人间关怀”。它们与前几年的“新写实”思潮虽然不无联系,但在叙事态度与艺术风格上,却与精英文学所标举的现实主义传统有深刻的相似或一致之处。它们当然存在着缺憾,艺术上也比较粗糙,不宜作过高的评价;然其积极参与现实的态度,对精英文学如何处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三

由于上述的蜕变与分化,这就必然导致精英文学从整体上出现了由中心向边缘的位移,先前那种君临一切和普济众生的优越,那种万众瞩目的精神领袖的地位不复重现了。与80年代中期以前

相比,诚如有的评论家所分析的,精英文学起码发生了这么几点变化:“第一,它不再有一个全面覆盖文学的价值中心,尽管这个价值中心因社会/历史因素的变化常呈现为不同的形态,但这个中心却始终存在并发挥巨大的影响;第二,它不再以民族/国家为价值主体;第三,它不再是民族/历史/大众的代言和对民众的‘强制性启蒙’,它不再具有拯救历史的权威性;第四,它不再与社会/政治/历史进程完全同步,不再为了其实现‘使命’牺牲个体的自由。”当然,“它立足于边缘,享受着边缘的自由,也承受着边缘的局限。……它是一种立足于个体的自我抚慰和温情寄托,是逃避现实生活激烈矛盾和冲突的梦幻世界和诗意情怀,也是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轻盈的消解。或许,这也是一种间接的‘审美的’抗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精英文学的边缘化并不完全等同于全部知识精英的边缘化。人文知识精英行使文化盟主、主导社会意识形态的时代可能终结了,其总体价值也有所下降,但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整体地位并没有动摇。科技知识精英更是备受社会与人们的尊敬,从边缘走进中心,逐渐形成一个引领风骚的独立群体,他们与人文知识精英中新崛起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等联袂,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实际运行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从艺术角度看,由于追求文体和形式的“先锋”和“激变”,也由于受西方现代文艺思想的影响,精英文学往往倾心于择取以丑为主的题材内容作为普遍的描写对象。特别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以来更是如此。于是,凶杀、丑陋、性爱、阴谋、欲望、颓败、创伤滚滚而来。与主导意识形态文学、大众文学重内容、轻形式不同,精英文学一般重形式,轻内容,现在,在相当一部分作家那里,已发展到了重语言乃至搞语言中心。80年代初中期浓烈的人文环境为精英文学思想艺术的先锋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即使丑的描写也不乏崇高审美理想的熔铸;而90年代社会文化结构的转型,使他们相应地产生了主体性的话语失落,其写丑的心境今非昔比,往往注入了更多的无奈、颓唐乃至自我放逐。市场经济固然推动了文学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也使文学取向一种大众的趣味。要求精英文学重现昨日思想上的异质性和艺术上的前卫性,保持精神品格的独立性,便会相应地要求他们重新确立自己在这个时代的话语位置。目前,大众文学随着社会世俗化的风起云涌,在事实上已行使文化霸权,主导意识形态凭藉国家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也试图一展雄姿,争夺话语的领导权;相形之下,精英文学处于令人不安的危机之中,境况堪忧。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精英作家们煞费苦心地动了许多脑筋。1994年,地处边陲的云南在全国精英作家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一个专发高层次探索之作的大型文学期刊《大家》,一时颇为轰动。但几年来,效果并不那么理想,精英作家发的作品普遍比较平平,这表明精英文学还在80年代的漩涡中打转。种种迹象昭示我们:中国的精英文学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它的发展前景虽毋须悲观,但也不必过于乐观,重要的是我们要立足现实,认清形势,在尊重其主体个性品格的基础上,扎扎实实地多做一些祛弊添利的工作。

世纪之交精英文学的发展,从内部结构看,主要面临两大问题:

一是在与主导意识形态文学的关系处理上,要尊重并注意协调,但不能放弃自己独立不倚的精神品格。不放弃并不是要与主导意识形态文学对抗,不是的,社会主义国情与社会主义文学的特性决定了我们的精英文学不仅不能与主导意识形态文学对抗,而且还要与之对话,进行互渗互补;而是说要有自己独特的话语系统,不能以丧失自我主体为代价成为主导政治权力话语的依附。此一情形在国家政权不断推出新的举措,加强力度支持主导意识形态文学创作(如“五个一工程”)的今天,值得引起注意。主导意识形态文学作为政府的权力话语,更强调现实功利性,具有较严格的政治、伦理规范。而精英文学由于崇尚精神独立和锲而不舍的艺术追求,则更注重超越性、永恒性。知识精英(推而广之是整个人文知识分子)从本质上讲,不是属于今天而是属于明天的(所以说人文知识分子最有用也最没用,它往往与主导意识形态文学不那么同步一致)。由于着眼于未来或曰憧憬未来,人文知识分子总是常常对今天的现实作着批评、批判。人文知识分子如果满足于现实,取

消批判和超越的职能,那么他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功能;从长远的利益上看,也并不对主导政治和社会文化带来什么福音。至少不能对它形成有效的监督,容易造成封闭、僵化的格局。我们之所以提出精英文学在与主导意识形态文学关系问题处理上要保持独立不倚的品格,主要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而正是在这点上,我们不无遗憾地指出,如今有些精英文学是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的:它们为了求取某种政治保险和实利,往往不是迎合就是回避现实政府倡导的有关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果程度不同地造成了主体的失落,使作品陷于平庸和肤浅,教训应该说是深刻的。这也提醒我们在当前及今后的创作中要时时保持对“官本位”思想的警惕。否则,精英文学不仅不能保持纯正的品格,甚至可能有被异化的危险。

二是在与大众文学关系的处理上,要注意吸纳其中的艺术民主化的因素,但不能放弃对其俗化思想的批判立场。俗化是大众文学常见的一个现象,也是很难根治的一个弊病。这是因为大众文学的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屈从“读者第一”的宗旨,即所谓的“从众原则”;而“从众”事实上也就是从俗。正因此,当八九十年代大众文学以咄咄逼人之势从边缘进军中心之时,其俗化思潮随之也像潮水一样弥漫开来,就是意料之中的事。随着文化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可以预测,在本世纪最后几年以及未来的 21 世纪,这种俗化现象将更严重。面对此一情形,是采取放任认同的态度,还是坚持批判遏制的立场,就尖锐地摆到了精英文学的面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许多有识之士曾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正是这种批判,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他们那里像洪水一样汹涌而来的俗化思潮,给西方高雅严肃的文学创作保留下一片葱茏的精神绿洲。中国与西方虽然国情不同,大众文学也不可同日而语,但“西马”上述的批判态度还是值得借鉴的。因为这种俗化思想从根本上讲是与精英文学相悖的,如果不对它进行有效的批评遏制,那么就会造成整体文学在精神上的大滑坡。近年来的事实也充分表明,有些作家可能是由于边缘心态的作祟以及文学启蒙的一再受挫,在艺术精神和审美趣味上不仅放弃了对俗化思想的批判,有的甚至对之进行精神认同,由原先的对大众的拒绝摇身一变而成为现在的大众中的普通一员,成为“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的大众生活的忠实“转述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十分赞赏作家余华对某些“新写实”作品的批评,他说:“当他们在描写斤斤计较人物时,我们会感到作家本人也在斤斤计较,这样的作家是在写实在的作品,而不是现实的作品。”所谓的“斤斤计较”,就是作家俗化的结果,也是作家俗化的表现。由此我们不难领悟,要想重振精英文学的辉煌,首先是要提高作家的思想素质和精神境界。只有“立人”,方能“立文”。这也许是我们从中得出的一个深刻的结论。

注:

参阅张清华《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参阅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259页。

周宪:《当前文化趣味的社会学分析》,《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5期。

陈平原:《关于“学人”、文学集刊编后三则》,载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

见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

徐德峰:《边缘乌托邦——90年代文学的一种价值定位》,《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责任编辑 徐枫]